

# 导 论

永恒的探索：贯串三个千年的日本  
“找寻亚洲－找寻自我”的“天路历程”〔共  
2 篇〕



## 论日本对亚洲关系中的“主流”和“逆流”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10 周年 分析  
日本右派的“历史篡改”事件

### 一、两“纪念日”——纪念哪一个？

今年 9 月，有两个跟东亚历史及其国际关系史密切的纪念日：一是“九·一八事变”的 51 周年，二是中日复交的 10 周年。一个是坏的纪念日，令人不愉快地记起日本军国主义者，并吞中国东北，向华东、华中各地扩大侵略的事件；另一个则是好的纪念日，标志着中日关系，在经历过多半个世纪的不正常状态后，正在揭开一个新的篇章。

两个纪念日，纪念哪个好呢？

答案是：两个都应该纪念的！

这里，牵涉到一些重要的问题：

一是，日本内部的发展，怎样决定着日本对外——特别是日朝、日中以及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

二是，东亚各地的内部发展——特别是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政

\* 本文是作者于 1982 年 9 月 16 日下午，在香港浸会学院学生会所举办的有关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问题座谈会上的演讲稿，原题为《历史发展中的“历史篡改”事件——纪念“9·18 事变”和日中邦交正常化 10 周年》刊载于香港《华侨日报》1982 年 9 月 18~22 日第 2 版。

治经济的兴衰逆变，提供一些什么因素，成为日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亚太政策的外部条件；

三是在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建立一个崭新的、互相尊重、平等互惠的国际关系的问题。

## 二、日本对外关系史中的“逆流”

在日本对东亚的关系之中，是有一个长期的破坏和平、侵犯邻国的历史的。

元代末年，倭寇开始侵犯中国沿海地区，明太祖曾于洪武二年（1369年）派人“诏谕其国，且诘以入寇之故”，“日本王良怀不奉命”即置之不理；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综观有明一代，倭寇之患，是此起彼伏的，特别是嘉靖年间，由于“滨海奸民，又往往勾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sup>①</sup>。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派遣大兵侵略朝鲜；企图从半岛进入中国的东北，攻打中国。在他给朝鲜国王宣祖（李昞）的信中，如此自夸：“……目光所及，无不照临，壮年必八表闻仁风，四海蒙夙名……夫人生于世也，虽历长生，古来不满百年，焉郁郁久居此乎？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

中国人应朝鲜人的要求，派兵前往援助。这个战争，一打就是七年多（1592—1598年），“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即朝鲜王朝，迄无胜算，至关白（即秀吉）死而祸始息<sup>②</sup>；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sup>③</sup>”。

③ 《明史·日本列传》。

《明史·朝鲜列传》。

朝鲜人历史笔记《燃梨室记述》的评论是：

（中国）征发浙、陕、湖、川、贵、云、缅南北兵 通二十万一千五百余人；往来诸将及任事人三百七十余员；粮费约五百八十三万二千余两；交易米豆银三百万两；实用本色粮米数十万斛；诸将赏金三千两；山东粮二十万斛。

因为战争爆发的 1592 年是干支“壬辰年”所以朝鲜人称这次战争为“壬辰倭乱”。

对于朝鲜人来说，这也是一次非常惨痛和耻辱的浩劫，《明史·朝鲜列传》说：

时朝鲜承平久，兵不习战；（国王李 昫）又酒酒弛备；猝岛夷作乱，望风皆溃 ①。

（倭贼）所向披靡 此由升平日久 民不知兵故也。贼兵不血刃、势如破竹；数十日间，已入京师，自古陷入国都之易，未有如今日者 ②。

因此 他们只能向“天朝（中国）求救了 中国人亦以“你国素称礼义之邦”，“贵国至诚、恭顺我天朝 特垂眷厚”无条件地出兵出粮 兵援 藩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朝鲜战争”也是日本人对东亚地区的第一次侵略行动。

明治维新之后出现的第二次侵略行动，至 1945 年 8 月才告一段落；综观这个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怀抱的野心和采取的扩张主义行动 基本上 是丰臣秀吉未了的心愿 加以实现而已。

① 《明史·朝鲜列传》。

② 《朝鲜王朝实录》卷廿六廿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在‘美式和平’架构之下 受到美国人的广泛而又大力的扶植，日本不但很快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新建立起来 而且 还在过去 20 年里发展成一个“经济大国”当“美式和平”进一步地从亚太地区消退时，出现了文部省“篡改历史”这样的事件，不禁令人们关心起一些重大的问题来：

1. 军国主义是否又死灰复燃了？——如果是，将是丰臣秀吉以来‘第三世代’的军国主义；
2. 日本是否即将走上第三次对亚太地区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
3. 除此之外，日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吗？

### 三、日本对外关系史中的“主流”

这里，还牵涉到历史的真相及其发展规律的问题：

1. 在历史上，日本和东亚及亚太地区——特别是对中国及朝鲜的关系，始终是一种敌对的、战争的关系吗？
2. 和平友好的关系，跟敌对侵略的年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出现的？或交替出现的？

先谈第一个问题，答案是清楚的：日本和亚太地区的关系，基本上是和平友好的，即，像丰臣秀吉及明治维新以后那种对邻国“进出军”的事件 到底是少见的 是应该被视为一股历史的逆流，而不是主流的！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和《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以及《宋史》(卷四百九十一)之中 都记载了日本跟朝鲜及中国之间友好往来的大量史实。《新唐书》说：“开元初 粟田复朝 请从诸儒受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寺为师，献大幅布为贽，悉赏物货书以归。其副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 多所该识 久乃返。”

《宋史》的一段记载 更反映出日中、日朝关系的密切：

雍熙元年(984年)日本国僧□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 献铜器十斛事 并本国“职员今”；王年代纪”各一卷，□然衣绿，自云姓藤原氏，父为真连；真连，其国五品官也。□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国中有《五经》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土宜五谷而少麦。交易用铜钱，文曰“乾文大宝”。畜有水牛、驴、羊、多犀、象。产丝蚕、多织绢，薄致可爱。乐有中国、高丽二部，四时寒暑，大类中国。国之东境接海岛，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东奥洲产黄金，别岛出白银，以为贡赋，国王以王为姓，传袭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

关于日中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更可以从东京大学教授木宫泰彦所著《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中见之 胡锡年把它译成中文 由北京商务印书馆于1980年加以印行。

“壬辰倭乱”种下了朝鲜对日本的仇恨；19世纪末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半岛的奴役掠夺，更增加了这个仇恨。举国上下，对日本的仇恨，便是汉城和平壤方面，对这一次“历史篡改事件”反应特别激烈的根本原因。

可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亦必须指出 在过去三四千年里 朝鲜和日本的关系，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状态，还是主要的一面。

朝鲜半岛是较早地接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日本和中国的接触，很多时候是以半岛为媒介的。推古天皇十五年（608年）7月 圣德子派遣大礼小野妹子 and 通事鞍作福利前来隋朝便是用百济人充任向导的。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半岛也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地方。

松田甲述的《日朝史话》①虽然充满着“日鲜共荣”为日本军

该书昭和二年（1926）初版，五十一年（1976）重印。

国主义并吞朝鲜半岛找来理论的企图，但是保存了日本和朝鲜和平相处、办好往来的大量史实的。

高丽王朝 918~1392 年 末年，有“朝鲜理学鼻祖”政治家、外交家之称的郑梦周于公元 1377 年出使日本，发现“日本氏有国最古，自汉、魏世通华夏；衣冠制度粲然可观”。他还写了许多首诗，其中包括这么一首：

海岛千年都邑开，乘槎到此久徘徊；  
山僧每为求诗至，地主时能送酒来。  
却喜人情犹可靠，休将物色共相猜；  
殊方孰谓无佳兴，日借肩舆访早梅。

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或称“李氏王朝”(1392~1910 年)后，也派过一位重臣申叔舟出使日本，回国后写了一本《海东诸国记》，是研究 15 世纪初叶东亚关系史（包括朝鲜琉球、日本）的重要文献。他也写过许多诗来记游。

这样的友好往来，在“壬辰倭乱”之前，络绎不绝，乱后不久，从 1600 年到 1868 年，也是持续不停的。

有趣的是，在“壬辰倭乱”之后，朝鲜人对日本国内许多方面的发展，反而是起着重大的作用的。日本陶瓷器的兴起，如“上野烧”、“高取烧”、“有田烧”（一名“伊万里烧”）、“唐津烧”、“河内烧”（一名“平户烧”）、“八代烧”（一名“高田烧”）、“小代烧”、“萨摩烧”以及“萩烧”（一名“松本烧”）等等，都是战争中被俘虏到日本各地的朝鲜人或其后人陶工发展出来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17 世纪以后，德川幕府统治之下，日本新儒

《日朝史话》第一编：《朝鲜李博多人的故事迹》第 32~34 页。

② 《日朝史话》第三编：《朝鲜役与日本之陶瓷器》。

学的发展，是在朝鲜人的影响之下形成的。

从“三国时代（公元前 18～公元 668 年）”“统一新罗时代”（668～918 年）到“高丽王朝”，朝鲜半岛是在佛教的笼罩之下<sup>①</sup>。“高丽王朝”末期，儒学开始兴起，到了“朝鲜王朝”，它终于后来居上，成为半岛上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并且，决定着整个社会文化体系发展的方向。在儒学之中，又以宋朝的理学——特别是“二程（颢、颐）和朱熹的学问，受到最高程度的肯定。所谓“朱子学”，在李朝，已经被神物化了，成为一种近似宗教的东西。

“朱子学”基本上是由李滉（退溪，1501～1570 年）发展出来的——他的著作，见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编印的《陶山全集》一至四卷（1980 年出版）。李退溪所撰述的《朱子书节要》及《自省录》对日本的儒学者发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有人列了一个“家谱”：“朱子——李退溪——大塚退野——元田东野”。更早的时候，还有藤原惺窝、林罗山以及木下顺庵等人。顺庵曾以“朱子”为题，写了这么一首诗：

遗经千岁决群疑，义理精微抽茧丝；  
仰止鹅湖论旧学，确乎鹿洞定新规。  
百王耆鉴纲目，四子阶梯录近思；  
顿悟金谿何是贵，泗源嫡派舍忍谁？

大塚退野这样说：

余壮岁、本于退溪先生之言，熟读“朱子书录”，窃窥得朱子之所为如是者，而记之终藏胸臆，信而从事于斯之

① 见李能和编：《朝鲜佛教通史》，1917 年版，第 187～189、474～479 页。

② 《日朝史话》第五编：《扬名朝鲜的木下庵》第 86 页。

凡四十年，虽知未有所得，不复他求，将终此生<sup>①</sup>。

这里，要点是，透过佛教，儒学以及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日-朝、朝-中、日-中、中-日朝之间友好往来，是东亚国际关系史的主流，是东亚国际事务及形势的主要状态；元世祖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征伐（1274、1281年）<sup>②</sup>以及丰臣秀吉和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两次“进军”是几股逆流；因此，不是历史的全部事实呢！

#### 四、“篡改历史”是以“逆流”代“主流”

从这样的历史事实及发展规律出发，对近年来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及极右派分子恢复军国主义的企图，日本、朝鲜、中国以及东南亚等地的人民是不应该予以姑息和容忍的，而要穷追猛打，群起而围攻之。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将对亚太，特别是东亚国际关系的主流又一次造成破坏；他们所妄图恢复的是已经给日本人民及亚洲人民造成过许多浩劫的那股逆流呢！

换句话说，防止这股逆流的出现，或泛滥成灾，是日本人民、朝鲜人民、苏联人民、中国人民、东南亚人民以及大洋洲和美国等地人民的历史任务。它既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潜伏着的一股逆流，因此，防患和迎头痛击的工作，也是长期的。在这次“历史篡改”事件平息之后，它还是会在不同的时期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反对“篡改历史”、反对军国主义复活、反对“第三次进军”的工作，不可能是一劳永逸，一了百了，还会有几次、几十次，甚至是几百、几千、几万次的！

<sup>①</sup>《日朝史话》第六编：《自省录与朱子书节录》，第44页；又见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与朝鲜》（东京大学1976年版）。

<sup>②</sup>见《元史》卷二百八。

## 五、“主流”与“逆流”出现的主观和客观条件

侵犯邻国的“逆流”压倒和平共存、友好往来的“主流”在日本交替出现，是有规律可以探寻的：

首先在内政上，一个专制的、独裁的力量高度而又严密地控制着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以及文化的各个领域。社会上，民主的、正义的、进步的、新生的力量完全遭受到压制；

在外事上（即国际形势上）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及东南亚等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系陷于四分五裂和腐化败乱之中，给日本扩张主义提供了充满诱惑性的、极其有利的外因。13世纪末年至16世纪末年，倭寇的为患中国及朝鲜沿海地区；丰臣秀吉的侵略战争以及明治维新以后的军国主义，其所以能所向无敌，亟尽破坏之能事，无可否认的，跟中、朝两国内部的腐败，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可见，日本内部的正常发展和亚太（特别是东亚各国）内部的正常发展，使日本与亚太国家的和平共存、友好往来这一历史主流得到有利的“大展鸿图”浩浩荡荡地伸展开去的机会，反之，侵犯邻国的“逆流”便有卷土重来，泛滥成灾的可能的——这便是东亚关系史的发展规律了。

根据此一“主流”军国主义复辟即“第三次进出”的可能性，在未来的三五十年里是不大的！原因即在于：（1）日本内部的发展不利于“逆流”的出现；（2）“亚太”各地的发展则是历史上少见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包括中国在内，朝鲜半岛、东南亚及大洋洲各地的国家，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重视独立自主；而其社会革命及社会

见黄枝连：《美国203年对“美国体系”的历史学与未来学分析》下卷，中流出版社1980年版，第555页。

建设的反复前进，亦是史无前例的——这就杜绝了丰臣秀吉和东条英机之流所代表的“逆流”复辟所需要的外部条件了！

三五十年后，“逆流”复辟所需要的内因及外因，会是更具备？或者，更是少之又少？则有待日本人民以及亚太（特别是朝鲜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了——历史洪流既然是不断地滚滚向前的，应该可以肯定：“逆流”的出现，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其可能性将是愈来愈小的！

因此，随着生产力的解放，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摆在人们面前的另一项文明创造的历史任务是：如何探寻并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来规范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平等互重的基础之上，建立友好往来，促进文化的关系，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 六、多为“主流”的浩荡前进创造条件

总而言之，在 1982 年的 9 月里，对“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和日中复交“纪念日”的纪念，其意义是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为“主流”对“逆流”的斗争，多加一把劲，多做一点贡献！

今年的 9 月，还有一件关乎东亚—亚太历史发展的事情，就是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对日本，中国以及香港地区的访问，在促进“主流”的发展上，也应该是一件好事的！

（1982 年 9 月 16 日于慈云山蒲岗村蒲岗楼）

## 找寻亚洲—找寻自我的日本东亚政策

——“天朝礼治体系”内外的中日 21 世纪  
关系的开展

### 一、中日文化关系对日本历史发展的评估问题

从中国的史书来看，日本始终不是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以礼义礼仪为形式的“天朝礼治体系”的一个成员——这一点，是跟朝鲜、琉球、安南、暹罗以及缅甸等大为不同的。

还有一点也是很清楚的：日本群岛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系统渊远流长完全不能说因为从中国输入文化，它们才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即，成为一个有文化的社会的。

《后汉书·倭传》的一段记载是很有意思的：

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几百余国……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纆、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无牛、马、虎、豹、羊、鹤。其兵有矛、盾、木弓、竹矢，或以骨为镞。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紒，衣如单被，贯头而着之；并以丹朱扮身，如中国之用粉也。有城栅屋室。父母兄弟异处，唯同男女无别。饮食以手，而用筴豆，俗皆徒跣，以蹲踞为恭敬。人性嗜酒。多寿考，至百余岁者甚众。国多女子，

大人皆四五妻，其余或两或三。女人不淫、不妒。风俗不盗窃、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没其门族。其死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等类就歌舞为乐。灼骨以下，用决吉凶……

《后汉书》的这一段记载 成为一个样板 后来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里，大体重复了一次。但，亦有所发展，如：

……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异，足相臣服。收租赋，有邸阁。国国有市，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

至于《册府元龟》卷九五九《外臣部·土风》的记载，近乎文抄公之作。迄《梁书·倭传》，仍无突破；一直到《隋书·倭国传》中国人对日本列岛的认识，才出现一个新的跃进。对于“倭王”的宫廷生活及其十二等内官、民间的男女衣着、风俗习惯等等，有新的报道：

……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戏饮酒；其余节，略与华同。好棋搏、握槊、柶蒲之戏……

如果我们接受《后汉书·倭传》是信史之作 或者 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反映了三国以前（即公元 200 年以前）日本列岛的社会情况；那么，下面的几个推论（分析议论）便是可以成立的：

其一，日本列岛的社会文化系统，跟中国的一样，都有一个很长的历史 在中日两地进行交流之前，它们已经形成 并且

自成一体了（无可否认地，见之于徐福的故事，许多避难东瀛的秦汉人士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观的贡献）

其二，日本列岛的社会文化系统的发展，在公元 2~3 世纪亦已达到了一个可观的程度。自有其相应于物理环境的生产方式，亦有一个建基其上的社会情境架构；人们的社会活动，是在一个个“大小有别、尊卑有差”的框架里有序展开、分工合作。即人与人、人与物的交流感应，是在一定的情境结构里开展，而其统治精英亦能进行相当广泛而又有效的掌控。

其三 日本各地的文化成就亦见之于它们已经具有一系列的概念、理论、方法以及模式来指导、处理每个人的生理系统和心理系统的活动并且建立一个群理系统使人们得以和平共处、生存发展。见之于养生有术“多寿考至百余岁者甚众”男女有别，不淫不妒；而在婚丧喜庆、人生阶段的过渡上，也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礼仪安排。

其四 日本人同自然界、超自然界的物理的、天理的关系利用节令和卜筮，也有初步的发展。

其实，如果把人们对生理、心理、群理以及物理等系统加以处理的能力、经验、习惯以及积累统统视之为文化活动及文明创造的表现，任何聚居的族群、群体都自有其社会文化系统的，无此则不足以群居、不可能相安无事的！因此，文化文明不外是社会生活过程中的产物；亦是群居的结构和过程。这里，日本人所欠缺的，可能就是儒学、佛学、汉医以及汉字和筷子这样的东西。

## 二、“中华一统”模式对日本历史发展的启示作用

当然，同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在同一个时间里发展的日本本土文化，由于国情不同，有着不同的模式，也就形成不同的传统——

换句话说,中国的模式、中华的传统,对于日本列岛各国,亦有其吸引人之处,可以引进、借鉴、改造、利用、发展的地方很多。因此,这就形成了从南北朝到唐朝中叶,日本人不辞劳苦,热衷于到中国参观学习、主动地输入中国文化,形成了一个运动。这成为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一个典范。在 21 世纪里,仍有其普世价值。

首先要指出,在中国,不同于日本的岛国文化,汉族建立的是一个“水稻文明”:它在河流的附近,开山辟地,利用雨水,种植水稻;及于瓜果蔬菜和蓄养家禽。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建立男性和父老长老为中心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财产制度以及家族社会。许多这样的家族社会构成的村落,进行横向联系,扩大为地方社会,逐渐地发展为地方政权。在春秋战国之前,统称之为“国”。显然地,到了殷周时代,国与国的联系与结合进程,在不断地开展,到了老子和孔子的时代,已出现几个大的集团。到了韩非子和荀子时代,秦国已在突出之中;终于促成了天下一统,秦汉帝国的应运而生。此后,中国便成为一个具有统一的、独特的宏观社会情境架构的地区;在中国,一切社会活动和一切个人的五理系统(生理、心理、群理、物理以及天理)的开发—开展活动,都是在这么一个大框架里来处理的。这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创造和文化经验。

换句话说,中国人在公元前五百至一千年(或者,更久远的时代里),已经学会在一个政治统一的社会文化系里来处理个人的、群体的以及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等等层面的关系——春秋战国以来中华文化的特点,即在此“统一性”之建立、发展、维系以及改造之上。它的优点在此,它的缺点也是在此。

对于日本统治精英来说,由于受秦汉“来归人”的文化影响,中国的吸引人之处,即在于它那一套建立并维系大规模社会的功夫之上吧!显然地,隋唐以前,日本列岛所处的各自为政的状态,可能近似于秦汉以前,甚至是殷周以前的“列国并立”状态,或者说,部落社会正在发展为地方政权组织,具有国家雏形的“初级阶

段”)这个混乱的过程 如果在天皇的系统之下 提早结束 是可以给日本国家(统一社会文化系统)的形成,制造有利的条件的——日本、朝鲜等处对中国文化的引进运动 其动力 看来 即在于‘统一性’的追求之上。

木宫泰彦有此议论:

……中国乃东洋文化之母国而有统一国家之组织者也;洛阳,又以数千年文化为背景之庄丽都城也;倭人来至中国,目睹其情形,必费往若干新知识,而对中国文化作热烈之钦慕。极思于政治方面亦如中国有统一国家组织;于经济方面,亦思如汉人有灿烂如花之生活也……可知卑弥呼时代,已渐入统一之途径矣。其不属于女王国卑弥呼者,仅其南方以男子为王之狗奴国耳。可知女王国与男王国,已成南北对峙之势。然则此时所以现统一国家之气运者,非由中国文化之刺戟而促进者欤!再观当时韩土亦有马韩中一国之百济,欲统一马韩诸国。辰韩中一国之新罗,欲统一辰韩诸国,此种运气之推移,亦可以资参考……

这里,日本学者清楚地指出,三国至南北朝时代,朝鲜人和日本人对“文化母国”之主要学习项目 即在于它的“统一国家组织”之上——有一点,是很有趣的,即卑弥呼女王对中华传统的热爱,真是“阴差阳错”近乎“自取灭亡”。因为中国的社会文化系统是一个男性中心、父权系统的东西;女性在其间是没有什么地位可言的。因此,对中华帝国模式的引进,必然要否定、扫清卑弥呼所代表的母系社会。其实,后来的历史证明,朝鲜人和日本人学习中国、引进中华传统的一个动力 便是男权社会的建立 即 男人造女人的反 用中华传统来夺权 并牢固地建立父权、夫权、王权 以压